

精神分析研究

第四辑



JING SHEN FEN XI YAN JIU



商务印書館
The Commercial Press

精神分析研究

第四辑



2018年·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精神分析研究. 第4辑/霍大同主编. —北京:商务印书馆, 2018

ISBN 978 - 7 - 100 - 16798 - 7

I . ①精… II . ①霍… III . ①精神分析—研究
IV . ①B84 - 06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253510 号

权利保留, 侵权必究。

精神分析研究

第四辑

霍大同 主编

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

(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)

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

北京市艺辉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ISBN 978 - 7 - 100 - 16798 - 7

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开本 787×1092 1/16

2018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20 1/4

定价: 58.00 元

主编

霍大同 谷建岭

副主编

居飞 秦伟 严和来 尹立 郑禹

编委

蔡婷婷 姜启壮 姜余 李锋 李娜 刘瑾 罗正杰 潘恒
石岩 陶杏华 许丹 杨春强 张涛 赵旻

本期执行编委

谷建岭 刘瑾 金伟闻 张沙沙

目 录

纪念米歇尔·吉布尔（Michel Guibal）先生专题

中法精神分析与心理治疗高级研讨班讲座

|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|
| | 米歇尔·吉布尔 / 主讲 霍大同 / 译 | (1) |
| 第一讲 介绍..... | | (3) |
| 第二讲 记忆..... | | (8) |
| 第三讲 重复..... | | (13) |
| 第四讲 爱与恨..... | | (17) |
| 第五讲 转移..... | | (23) |
| 第六讲 压抑..... | | (28) |
| 第七讲 阴割..... | | (34) |
| 第八讲 原始场景..... | | (41) |
| 第九讲 精神分析的局限..... | | (47) |
| 第十讲 再见..... | | (53) |
| 后记..... | | (57) |

“创伤理论”专题讲座

| | | |
|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|
| | 米歇尔·吉布尔 / 主讲 霍大同 / 译 | (59) |
| 第一讲..... | | (61) |
| 第二讲..... | | (65) |

| | |
|------|---------|
| 第三讲 | (70) |
| 第四讲 | (74) |
| 第五讲 | (79) |
| 第六讲 | (87) |
| 第七讲 | (95) |
| 第八讲 | (101) |
| 第九讲 | (108) |
| 第十讲 | (116) |
| 第十一讲 | (120) |
| 第十二讲 | (124) |
| 第十三讲 | (127) |

何为精神分析? 米歇尔·吉布尔 / 主讲 霍大同 / 译 (139)

黑手党母亲 米歇尔·吉布尔 / 著 佚名 / 译 (146)

一例幻听个案的分析治疗

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| 米歇尔·吉布尔 / 主讲 霍大同 / 译 (151) |
| 开场白 | (153) |
| 第一讲 | (157) |
| 第二讲 | (166) |
| 第三讲 | (174) |
| 第四讲 | (181) |
| 第五讲 | (188) |
| 第六讲 | (195) |
| 第七讲 | (202) |

拉康与孟子 米歇尔·吉布尔 / 主讲 霍大同 / 译 (209)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第一讲 辞说 | (211) |
| 第二讲 男人和女人 | (221) |
| 第三讲 反对语言学家 | (228) |
| 第四讲 反对语言学家(续) | (236) |
| 第五讲 天下之言性也 | (245) |
| 第六讲 冲动：性与死 | (257) |
| 第七讲 从威廉·海希到临水夫人 | (268) |
| 第八讲 临水夫人陈靖姑 | (278) |
| 第九讲 声音的知识 | (285) |
| 第十讲 Ludus | (294) |
| 第十一讲 结语..... | (302) |

中法精神分析与心理治疗

高级研讨班讲座*

米歇尔·吉布尔 / 主讲

霍大同 / 译 秦伟等 / 记录整理

陶杏华、赵旻 / 编校

* 原载于成都精神分析中心内部刊物《精神分析笔记》第二卷第三期，主编：霍大同，
副主编：秦伟、张晶艳，执行编辑：郑禹、尹立、严和来。

第一讲 介绍^{*}

很高兴认识大家！

我接受的是医学训练，主要是精神病学的训练，我在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之后，作为一名住院医生到精神病院工作。当时我们的主任开枪自杀，这件事对所有的人都影响极大，大家都极为震惊。于是，我向精神分析求教，为什么他要自杀？为什么我们被震惊？是个人的痛苦使我去接受精神分析，由此我解除了痛苦，并爱上了精神分析，最后成了一名精神分析家。

现在讲一下精神分析与医学、精神病学、神经病学的关系。

精神分析是由一个精神病科和神经科医生创立的，他就是弗洛伊德。他研究神经科学，之后遇到了癔症。作为一种神经症、一种综合症，癔症有许多形式。医生们试图找到其器官原因，但都未成功。医生有一种自恋的倾向：当找到原因时，大家十分高兴，当找不到原因时，大家感到十分痛苦。医生对病人很好，却找不到原因，于是只好想各种各样的方法。

弗洛伊德当时在维也纳，听说在法国南锡有人使用催眠疗法治疗癔症。催眠有两个作用：一是找原因，二是它是一种治疗方式。比起其它方法，催眠有一个优越性，即在睡眠中不知不觉地治疗，治疗过程没有什么痛苦。弗洛伊德觉得这更为人道，所以去学习。

西方文化的传统是身心分离的传统。在癔症中人们看到身—心的分裂，身体症状取代了心理症状。

* 时间：2000年8月11日晚7：00—9：30。

癔症是躯体症状，是在精神症状中占有主导地位的躯体症状。

中国文化讲身心统一，但此统一性遇到了西方人的问题。

弗洛伊德看到了这个在精神中的躯体症状，因为癔症病人是在睡眠中说话的——不是身体在讲，而是精神在讲。

这就产生了一个概念：躯体转换。有一个精神性的东西引起躯体问题，例如肢体瘫痪而找不到神经系统的问题。又例如一个人头痛，医生检查了，说一切都正常。那就是心理出了问题。如果进行催眠的话，患者将讲话，不是讲头痛，而是讲让他觉得头痛的原因。

在催眠下患者讲的东西是他从来未曾给任何人讲的，甚至是从来不曾意识到——童年回忆。弗洛伊德发现，身体所表达的症状是童年经验的扭曲表达——某个记忆，但不是一个一般的记忆，而躯体症状则代表了这个记忆。这个记忆不可能被说出来，只能以躯体症状的方式讲出来。这就是弗洛伊德通过进行催眠实践而对于癔症的发现。

由此，弗洛伊德建立了两个重要的概念：

转换——精神到躯体（的转换）

压抑——不能说出来，所以转换

弗洛伊德为此发现十分高兴。他把手放在病人前额上进行催眠，然后让对方讲童年历史。但另一方面，病人醒来以后症状转移了，例如从头转到手、手转到足。结果，讲出了原因却未治好，弗洛伊德为此又不高兴了。

弗洛伊德不高兴，他不满足、不停留，而是继续思考。后来一个女病人对弗洛伊德帮助很大。她有一次说：“别碰我，只听我说！”对于这样的一句话，一般医生不会在意。弗洛伊德却在意，他听从了她的话，开始按她的要求去倾听，在清醒状态下进行治疗。

法国有一个著名的汉学家、作家，即《费加罗报》的专栏作者阿兰伯·赫费特，写过一本书名叫《当中国醒过来的时候》，意思是中国醒来之后不得了。对于精神分析也是如此，当病人醒过来的时候也是不得了——这是关键的时刻！

阿兰伯·赫费特的意思是中国现在正在睡觉。但这几天我在北京和成都的生活中发现，中国一直醒着，中国是一个大工地，特别是四川大学。工地会睡着吗？所以不能说中国是典型的癔症。不过也许由于精神分析的引入，中国可以讲述她的童年。

阿兰伯·赫费特先生已经长眠了，我们也可以回来讲我们的精神分析了。

这个女病人讲的仍然是童年的故事，与催眠的情况类似。但是差别在于，她现在讲得十分吃力和痛苦。这一痛苦，弗洛伊德认为是必须的。因为这不同于躯体的痛苦，它是精神性的，对于解除症状而言是必须的。

在与弗洛伊德工作中，女病人突然讲了两件（她从未记起过的）事情，都是童年时的性的诱惑，这让弗洛伊德十分震惊，同时也让患者十分震惊。诱惑——她受到性的诱惑，但不是行动——导致了她的症状。

作为受过医学教育的医生，弗洛伊德自然地将此加以推广，提出幼年创伤理论。

这就牵扯到回忆。回忆可以是真实的、已发生的事件，也可以是幻觉的回忆。

女病人相信诱惑是真实发生过的，所以弗洛伊德相信，这种回忆意味着她经受了一个实际的创伤经验：

童年时的性场景（原始场景）：孩子看到父母做爱。

在幼年期间，孩子可能更多地关注吃、玩等，而性场景的出现扰乱了孩子的心理发展。

讨 论

听众：是不是所有的癔症病人都经历了原始场景？

吉布尔（以下简称“吉”）：下次再讲这一问题。弗洛伊德提出性的问题，这在当时引起了公愤，大家认为是丑闻。在认识论上，医生们倾向于一种病对应于一种原因，所以弗洛伊德通过一个个案而相信这个

唯一的原因能够解释所有的症状。不过后来，弗洛伊德有变化，承认存在个体差异。

听众：能不能有别的创伤？

吉：弗洛伊德后来遇到了一个三、四十岁的女病人，她不断咳嗽，所有医生对此均无办法，所以这不是躯体的原因。弗洛伊德对她进行分析，在分析过程中，她突然回忆起，在她很小的时候父亲去世，她十分痛苦，守孝六个月。此经验已经被遗忘。当她讲出来之后症状就消失了。

于是弗洛伊德又对此加以推广，说女儿爱父亲，因父亲的死亡而受到极大的创伤，进而说女儿爱父亲，儿子爱母亲。读者也会这样做出一般的推广和夸大。

以上说的弗洛伊德的第一步，是最重要的一步。

当精神分析家接触到一个新病人的时候，他所面临的是崭新的人、崭新的对象，他忘记了以前所读过的、所见过的一切，一切都重新开始，因为个体的独特性是不可比较的。这和医生正好相反，医生是试图一般化一切，将个体归入某个分类系统之中。

听众：忘掉了以前的经验如何帮助病人呢？

吉：让他讲述他的历史，由此发现被压抑的东西，并解除压抑，这类似于浪漫的奇遇。

听众：你的立场是什么？

吉：我一只脚站在古典的一边，一只脚站在现代的一边。之所以说是古典的，是因为我已经六十多岁了；说是现代的，是因为比起那些年纪更大的精神分析家而言，我还较年轻。我感到很舒服，没有什么冲突，因为中国人讲“一阴一阳谓之道”。我来中国，本身就说明我是开放的，否则我就和别的分析家一样，去蓝色海岸度假了。

精神分析容许一种转换，从过去到现在的转换，这并不痛苦。笛卡尔的传统是身心分离的传统，这在法国占主导地位。

中国可能不一样。

精神分析派别很多，这是好事，只是大家要能够相互交流。这就好

像中国的儒家和道家，它们都有许多流派。

心理咨询是给人以建议，而精神分析这一学科则是接受了病人的建议才出现的——“不要碰我，只听我说！”弗洛伊德假设了病人有能力知道并解决自己的问题，而心理咨询却假设病人没有这一能力。弗洛伊德受了很好的教育，本应给人以建议，但是他的天才却使他放弃了这些建议，而追随病人的建议。

第二讲 记忆^{*}

你们上次听我讲，也许没有抓住什么东西，所以我担心大家不来了，特别是今天雨又大，是很好的借口。不过大家都来了。在一个与西方文化差异甚大的中国，人们对精神分析感兴趣，表明大家对西方文化感兴趣。

还是从弗洛伊德讲起。当时弗洛伊德的父亲去世了，弗洛伊德悲痛得影响了工作，做了许多梦，于是他开始分析自己，进而写了《释梦》，成为了精神分析的开创者。

弗洛伊德自己很痛苦，通过梦，他发现了此前完全遗忘的童年记忆。如同癔症病人的自由联想一样，他记下了梦，然后想到什么记什么，反复此过程，发现了许多遗忘的童年记忆。

他通过梦发现童年的经验，并写了一本书，是写给广大读者的，让专家之外的读者也来阅读，特别是那些内心深处的东西。这在维也纳医学界引起轰动，成了一件丑闻。弗洛伊德之所以坚持这样做，是因为父亲的去世使他很痛苦，他通过自由联想而有了一个缓解。这一方法也正是他治疗癔症的方法。

癔症最大的特征，是记忆被遗忘但是仍然存在于内心深处，表现在躯体症状上。由自由联想而唤起记忆，从而能够治疗癔症症状。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，童年记忆是真实的还是虚幻的？

我们的研讨班是在哲学系的背景下举办的，而弗洛伊德当时是在医学院背景下进行工作的。医生为了治疗，必须找到病因。弗洛伊德发现的方法就是自由联想——回忆过去，这一做法将问题一般化了——主体

* 时间：2000年8月14日晚7：00—9：30。

存在的问题、历史的问题。主体存在本身是怎么一回事？父母、兄弟、姊妹是怎样的？这都和他生活在其中的、他所属于的那个群体有关。例如头痛，引出了主体历史的存在与其群体的关系。弗洛伊德之所以这样做，是因为他通过自己释梦（也许弗洛伊德患有强迫症）而得到了缓解。

弗洛伊德属于犹太人共同体，后者又处在德奥文化中。《释梦》出版之后，遭到许多人的批评，这也与反犹的背景有关。因此癔症回忆与此共同体联在一起。头痛可能与共同体的政治、历史联在一起。也许中国人的头痛与中国文化、政治、历史联在一起。因为人格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、这样的文化中构造的。

此时我想起一个成都人，是女的，叫张蓉，她在英国，写了一本书叫《鸿》。她在书中讲述了父母、祖父母的历史，类似于弗洛伊德在《释梦》中的讲述，尽管二人都是在没有精神分析家的帮助下讲述。请不要认为这很容易，你们可以自己试一试，发现回忆是困难的，并且是痛苦的。

这就是弗洛伊德所提议的回忆，对于自己、对于家庭、对于共同体的回忆。

弗洛伊德在处理这个问题时，把疾病转成了个人的、社会的和存在的历史。精神病学没有办法，但是不得不找到一个方法。例如一个人引起了社会的混乱，警察就将他抓起来，要么送进监狱，要么送进精神病院。这样精神病院的医生们起了保证社会稳定的作用。

精神分析不回应社会的这个需要，而把这一工作留给精神病学家。精神分析只让患者讲，给患者一个言说的权利，这是精神分析与精神病学之间的差异。张蓉讲母亲的故事，通过她的讲述，我们注意到，不仅是弗洛伊德，还有别的人也发现症状与文化、政治和宗教是相关的。所以，弗洛伊德要求患者进行充分的联想，讲述历史，以达到身心的健康。

在中世纪，基督教、天主教中有忏悔的传统，但这不是自由联想，而是说如何犯了原罪，神甫予以原谅。曾有一个时期，神甫不原谅，而是起诉此人及其家人。所以在弗洛伊德之前，人就知道人的历史与家庭、与共同体的历史是联在一起的。为了了解此人的历史，可以查档案，询

问其周围的人——这是社会学调查。精神分析不这样做，它只采用躺椅，只是让他讲述，以此了解此人的历史；同时让此人也了解、也懂得自己的历史。

作为医生，弗洛伊德在患者讲述之后绝不转述于他人，而是将其作为一个秘密。这一点很重要。我的朋友在阿根廷军政府时期因为拒绝政府对于患者的调查而入狱。

精神分析就是让患者讲述其回忆，大多数是与历史事件有关的。这是弗洛伊德在自己身上发现的，并用于癔症患者身上。霍大同经常有一个口误，混淆两个法语单词：Hystérique, Historique。弗洛伊德在 Hystérique 那里发现了 Historique（霍大同先生补充：我有一个历史学训练的背景，所以在精神分析家的面孔背后，还有一个历史学家的角色）。

对于霍大同自己而言，解释是一种快乐，他通过这个语误而发现了问题，但这与你们无关，所以你们不感到快乐。

弗洛伊德说，作为一个癔症患者，在意识中认识不到自己被压抑的历史，但是其身体认识到了。治疗的任务就是回忆，把身体所认识到的历史转成意识中的历史。

讨 论

听众：如何区别真实的与虚幻的记忆？

吉：弗洛伊德刚开始时并未意识到这一问题，如果回忆都是真实的，那精神分析就太漂亮了。但是情况并非如此。弗洛伊德发现了患者创造出来的记忆，试图区别真的记忆与假的记忆，他将后者称为屏蔽记忆（Souvenirs Ecrans）；因为癔症患者很难讲述真实记忆，所以以假的屏蔽记忆抵挡了对真实记忆的重忆。在精神分析引入法国很久之后，法国的精神分析家才认识到二者同样的重要，都是积极的，对二者进行区别不是精神分析家的工作，精神分析家既不满足于真实记忆也不满足于虚幻记忆。